

临汝县的土地改革运动(下)

李翔宇

公开党的组织,整顿党员干部队伍,使广大党员、干部在思想上、工作上适应土改工作的需要。全县大多数党员,都是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培养发展起来的,入党时间短,政治觉悟、思想作风、党性观念诸方面都不很成熟。少数人入了党、当了干部,就摆起了架子,脱离了群众,有的甚至与地主恶霸同流合污。当时的村级党组织,党员还处于秘密状态,不能适应领导土改斗争的需要。为此,土改伊始,土改工作队(队)就分期公开了各村党组织和党员名单,使群众明白共产党在为他们撑腰,共产党员就在他们身边,增强了土改斗争的决心和信心。接着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以“查阶级、查思想、查作风”和“整顿组织、整顿思想、整顿作风”为内容的整党整干工作。据全县55个乡统计,参加整党整干的675名党员,绝大多数都提高了思想觉悟,克服了不良作风,在土改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。另有21名犯有错误的党员,分别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。

通过整党整干,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,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,增强了党性观念和革命斗志,为加强党对土改工作的领导,全面完成土改任务,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创造了良好条件。

坚定不移地依靠贫雇农,团结中农,整顿农会组织,组成强大的土改大军。土改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。开始一部分贫雇农对土改的意义认识不足,对为什么要土改,怎样进行土改,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和糊涂认识。对此,在土改中,党的各级组织时刻注意发动群众,发动贫雇农,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,依靠已经觉悟起来的群众,用扎根、串连、滚雪球的办法,深入到广大贫苦农民中间,发展壮大土改工作队,并把他们组织起来,在党支部的领导下,建立贫农团或农会领导下的贫农小组,具体组织实施土改中的各项活动。

农协是团结广大贫苦农民的纽带和桥梁。土改前,全县农协有三种类型。组织纯洁、领导干部立场坚定的农会占30%;一般的占51%;其余19%的农会被地主恶霸直接或间接控制着。农会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,极大地影响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县委决定对全县的农会组织进行整顿。对好的农会,充分信任,因势利导,支持他们开展工作;对一般的农会,进一步发动群众,培养骨干,充实农会领导班子,提高其战斗力;对问题较多的农会,重新发动群众,清除混入农会组织的地霸分子和其代理人,重新审查农会会员,使其真正成为代表

贫雇农利益的农会组织。同时还建立了民兵、青年团、妇委会等组织,调动多方面群众参加土改的积极性,为胜利完成土改任务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
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土改政策。在土改工作中,运用各种形式,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,召开各种会议,反复向干部和群众讲党的土改政策,把政策交给群众,提高干部、群众执行土改政策的自觉性。为了接受急性土改时“走马点火”,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,在政治上扩大打击面的教训,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“中间不动两头平”的土改政策,重点解决“两头平”的问题。在划分阶级成分、调整和平分土地、颁发土地证等各项工作中,始终把执行党的政策放在首位,随时纠正正在执行政策中“左”的和“右”的倾向,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土改工作刚开始时,不少地方都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。据全县8个区中11个乡117个村统计,共侵犯中农257户。六区东沟村10户中农,斗争了4户。一区沙古堆村,因该村没有地、富,在代会上乡干部批评村干部界限不清、斗争不力,散会后村干部就对4户中农进行了斗争。针对这些情况,县委及时召开区委书记会议,并深入土改一线,反复宣讲政策,讲明“中农是农民队伍的一部分,中农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自己劳动,他们是劳动人民,应该受到保护”,启发大家从思想上真正弄通,在工作中千万不能把中农推出去,造成扩大敌人力量、孤立自己的后果。通过学习,大家思想认识提高了,执行政策坚决了,纠正了土改中出现的各种偏差。

划分阶级成分,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,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。土改工作中,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《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》及《怎样划分农村阶级》等文件精神,严格认真地划分阶级成分,分清敌我,团结90%以上的人民群众,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农村封建势力。其方法是:以乡为单位召开农民代表会,把全乡地主、富农标准搞清楚,然后三榜定案。第一榜划出地主、富农名单,各村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,公布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,公布第一榜划出的地主、富农名单。然后,让第一榜公布的地主、富农自报成分,通过审核复查,公布第二榜和第三榜。划分阶级成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一部分中农错划为富农或地主,据四、五、六、七区42个乡的统计,第三榜公布的地主、富农名单中,中农被错划为富农的有130户,错划为地主的4

户,还有4户应划为富农的而没有划。对存在类似的问题,各级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,严格按照政策规定,错划的坚决纠正过来,漏掉的重新补上。通过划分阶级成分,农村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全县共划出地主3335户,富农2129户,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地、富势力。

土地改革的最后阶段的工作是没收地主的土地、财产和富农的一部分土地、财产,并把这些土地、财产,按政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。全县共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103696亩,房屋37335间,牲口3046头,粮食189383斤。为搞好土改果实的分配工作,各村首先由农会会员推选出大公无私的会员和干部,组成土改果实分配委员会,组织群众学习土改果实分配原则,反复讨论,按照“中间不动两头平”的政策原则,贫雇农优先分配。为了让地主、富农有饭吃,也按人口给地主分1份土地,给富农留1份土地。对没收和征收地主、富农的房屋、牲口、农具、家具、衣物、粮食等,由分配委员会按政策分给贫雇农民。

解决土改遗留问题,颁发《土地房产所有证》。1950年11月,县委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,对土地改革工作进行复查,认真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,然后进行丈量土地,评定产量,确定地权,向广大群众颁发《土地房产所有证》。土地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,彻底消灭了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的根源,广大劳苦大众彻底翻了身,当了主人,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,纷纷在自己的宅基地上修房盖屋,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,在耕地边上栽种树木,购置牲口、农具,修厕所、建粪池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高潮。1950年全县播种夏粮70万亩,总产量达到6228万斤,平均亩产达到88.8斤,比解放前的1946年增产3.2%。秋季增长幅度更大。

土地改革运动,进一步确定了农村贫雇农的阶级优势,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专政,解放了农村生产力,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。同时,也在斗争中锻炼和考验了党员和干部队伍,发现、培养了一大批热爱共产党、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积极分子,为全面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任务,迎接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新高潮的到来,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

仰韶文化红陶鼓

大张遗址位于汝州市区西北15里许,骑岭乡大张村西的一处黄土台地上,地势北高南低,背坡向阳,遗址高出河床近3米,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。文化层厚约2米,遗址内遗物相当丰富,陶、石器并存。石器均系河卵石精磨而成,有石斧、石凿、石刀、石铲等;陶器以泥制红陶为主,夹砂陶次之,还散存着部分泥质黑陶及灰陶。1959年在此修建水库时,人们发现了该遗址,随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遗址上进行了科学发掘,从采集的实物看,大张遗址文物性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早期,是仰韶文化向龙山过渡期的文化遗存。1963年6月30日,大张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记载尧命质用麋鹿皮蒙在瓦缶的口中,用来敲击。即古代的陶鼓多是以陶土烧制鼓框,再蒙以动物的皮膜做成,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,大多只剩下陶土烧制的鼓身。

1960年,在大张遗址考古发掘中,考古人员曾意外出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红陶鼓一件,通高64.0厘米,口径29.7厘米。该件器物的口缘饰一周牙状倒钩,束腰尖底,下腹部有一小圆孔。口沿处的牙状倒钩用于固定和撑开皮革,而下腹部的圆孔用于声音的流动。关于这类器物的用途考古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。另一说认为此器为瓮棺,多用于盛殓夭折的婴儿尸体,腹部留小孔以供其灵魂出入。也有专家认为存在一器多用的可能性。此器经复原蒙皮后,拍击振动充分,声音洪亮,与现今的木鼓类似,至少可说明此类陶器有明显的音乐性。

汝州文物

大张遗址出土文物仰韶文化红陶鼓

刘孟博

喜禅师的传说

喜禅师是风穴寺的一名高僧。

传说,喜禅师的母亲一天做梦,梦见一个头陀,骑着一头大象到她家门口,手里拿着一柄如意,对她说:“把这寄存在你家,仔细收好。”喜禅师的母亲跪在地上接过了那柄如意,问:“大师是哪里的?”头陀把手往西方一指说:“峨眉雪锁白云深。”说罢,不见了。

喜禅师的母亲醒来后,顿觉腹痛难忍,生下了喜禅师,因梦中头陀的话中有峨云二字,就给喜禅师取名云峨。喜禅师小时候非常聪明,读过书后即能背诵。十岁那年,喜禅师有一天到河边洗澡,碰见河里有一具死尸,被河边的鱼鳖啃得稀烂,忽然想到:人死了之后,尸体腐烂不存,灵魂到哪去了?这样一想,又觉得世上生命无常,灵魂永在,不如到寺里出家做个和尚。喜禅师的父母听说儿子要出家做和尚,开始不答应,后来想起生他之前他娘做的那个奇怪的梦,就同意了。

喜禅师出家做了和尚后,读遍佛经。听说有个奇禅师是位高僧,就想拜奇禅师为师。奇禅师问他:“山河大地,明暗色空,与你同是别?”喜禅师说:“同则总同,别则总别。”奇禅师闭目说道:“罢,罢,罢,休,休,休,横眠倒卧在山丘。”喜禅师听了这句话,站在那儿百思不得其解,正想着,奇禅师用力推了他一把,一下子把他从悬崖上推倒了。喜禅师摔倒在悬崖下,心中忽然顿悟:这世界上原无同别,四大皆空,看来自己的悟性还不够啊!

喜禅师又去见奇禅师,说:“师父,弟子稍有感悟,山河大地,明暗色空,无同无别,四大皆空。”奇禅师面露喜色,说道:“既然四大皆空,还来见我干甚?你且去山中砍柴。”

喜禅师在山中砍了三年柴。有一天,奇禅师把他叫去,对他说:“我要到大别山普济寺云游,你就回寺当个主持僧吧!”喜禅师大吃一惊,说道:“弟子佛法浅陋,岂能担此重任?”奇禅师说:“砍柴三年,名利皆无,口无怨言,堪当重任。”

喜禅师当了风穴寺主持,悟出了苦谛、集谛、灭谛、道谛佛家四谛,精通了佛教大乘经和小乘经,道行更高了。他身边也聚集了不少弟子,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拜他为师。

汝州知州听说喜禅师道行很深,就坐着轿来拜访他。当时汝州瘟疫成灾,死了许多老百姓,知州就向喜禅师询问治疗瘟疫的办法。喜禅师说:“三月任凭君行早,汝水源头看水草。”说罢,闭目再也不发一言。

知州回到府里,仔细琢磨喜禅师这句话,忽有所悟,命令各乡医生都到汝水滩头去捞水草,然后煎草成汤,让患病的人喝。喝了之后,瘟疫很快就好了。

百姓们听说喜禅师说出的治疗瘟疫的药方救了汝州百姓,一齐捐钱捐物给风穴寺,重修了风穴寺的大雄宝殿。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

民间故事

欢欣鼓舞

王志斌 摄



老行当之代写书信

李晓伟

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

代写书信是一个存续历史较长、消失较早的行当,因为当年我们中国人文盲较多,写封书信非有人代笔不可。

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,在中大街邮电局门口,就有一个代写书信的老先生。老先生年逾花甲,面皮白净,戴着眼镜,精神矍铄。一个小摊位,一桌一椅一凳,摊位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本稿纸,一摞信封,一本早已看不清封面的字典,几块压书石散放在桌面,桌上一个招牌上,上书代写书信。

这就是摊位的全部内容。那时候,通信不发达,老先生在邮局旁摆了摊儿,生意颇红火。最高峰的那一天,他曾笔不离手写了几十封信,直到黄昏时摊前还排着队。

敬启者,见字如面;余容后稟,善自珍摄。代写的书信一般这样开头,既文雅又显得有文化。这样千篇一律的开头和结尾,放之四海而皆准,保准不会出错。这些书信,不仅有宏大叙事中的家国情怀,也有时代、社会,家庭造就的脉脉温情。

代人写信有两种,一是客人表达能力强,由老先生一句不误照录;一是絮絮叨叨说不囫圇要表达的意思,全凭自己揣摩着遣词造

句,并根据客人要求或横写或竖写,或简体或繁体,把讲述变成收信人明白的文字。

因为邮电局跟新华书店相邻,有时候放学路过,在逛完书店之后,只要有生意,我总会默默站在老先生的书桌前,看他行云流水、笔走龙蛇,很是艳羡老先生那满腹才华和一笔好字。至于具体如何收费?倒没怎么注意。

也有客人不识字,拿着家信前来讨教的。老先生便抑扬顿挫地耐心读讲一番,再帮着把回信写好。行文毕,他会低声细语读给客人听——压低嗓音,为的是隐私不外漏,客人听出遗漏的内容要求添上,他则有求必应,何时满意,何时誊写。誊写前,他总忘不了问问要不要首尾加些书信套语,如别来无恙、久不晤见,书不尽意、不尽欲言、盼即赐复、翘企示复……

写信,写信封,贴邮票,全程一站式服务。收费,则视信的长短而定。“砚田笔耕”蝇头小利,却是老先生上世纪80年代养家糊口的重要经济来源。

那时候县城就那么大,老先生家在离邮局不远的地方,步行十多分钟能来回。如果哪天他有事来不了或回家吃饭,也会让摊儿原地坐守,静候客人等待。

生意正好,老先生也会在摊上吃饭。生意

清淡的时候,老先生枯坐桌前,神情落寞。一对圆镜的老花镜挂在他写满沧桑的脸上,他饱含风霜的目光眺望着长长的街道。他在盼望着,他在等待着,期盼着生意的到来……

在知识分子缺乏的时代,识文断字者往往会备受青睐,引车贩浆者投来羡慕和钦佩的目光,往往尊称这些人为“文化人”。

彼时,书信是最重要的联系方式。但由于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,不会自己写信,所以才更凸显书写的必要性。同时,书信有着严格的称呼、格式的讲究,好的书信就是篇好的文章,其中家书寄托着浓浓的思念,不像如今,虽然文化普及率越来越高,几乎没有文盲了,但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信该怎么写了。

从古到今,有文化的人写信是件轻而易举的事,而对于目不识丁的“睁眼瞎”文盲们,写封信要把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的想法告诉远方的亲人和朋友,却比登天还难。写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人们相互交流信息的主要方式,彩笔尺素,鸿雁传书,自古以来演绎出不少悲欢离合的人间感情故事。

因为老先生文笔好,态度热情谦和,生意相当不错。说到代写书信的收入,显然不过是蝇头小利。很长一段时间内,国内平信的邮资

只有八分钱。代书者写一封信的收取费用视长短而定,扣除信纸信封等成本之后的实际进账,也不过几毛钱。当年生活水平低,非薄收入便可养家糊口,日子虽清贫,但也到不了断粮挨饿的程度。

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转动,知识普及率越来越高,“手无缚鸡之力”和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这样的嘲讽词不绝于耳,三教九流里也有了书生的一席之地。老先生代写书信的生意逐渐淡出了日常生活,前来找他写信的人越来越少,桌上那瓶墨水也变得越来“耐用”。

就这样,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,老先生和他的代写书信行当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时代的大潮中。每次走过中大街,走到老邮电局门口,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老先生躬坐伏案、奋笔疾书的模样。这种最古老最朴实最直接最普通的交流方式逐渐老去,湮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时,我们不得不以这种形式来追思。

如今,人们通过网络就可以联系了,比如手机,能直接对话,能直接面对面沟通,谁还会费心费力地写信呢。

倒罢了老先生那句文绉绉的话:探我行囊,惟有清风明月耳。